

关于回鹘文佛教文献和《金光明经》的发现和研究

耿世民

一、关于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前，科学界不知道有维吾尔佛教文献存在。大多数人认为维吾尔人民自古以来就信仰伊斯兰教。

早在 1890 年，英国上尉包威尔（Bower）因追缉逃犯来到库车。他偶然从一居民手中买到写有婆罗米字母的桦树皮写本。之后，该写本送到印度加尔各达（Calcutta）。经过著名东方学家霍尔恩（R. Hoernle）教授的鉴定，该写本为属于公元 4 世纪的梵文古书。这就一下子引起轰动。与此同时，俄国驻喀什领事彼特罗夫斯基（N. F. Peterovsky）也致力于搜购和田和库车等地出土的写本及其它古物。之后，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 N. Krotkov）也在努力搜购土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其它文物。所有他们搜购的古物，后都送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并保存在那里的亚洲博物馆。1892 年法国学者杜特罗依·德·兰（Dutreuil de Rhines）在和田巴扎尔（市集）上也买到一桦树皮写本。这一写本在欧洲引起更大的轰动。1897 年在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家大会上，法国梵文学家色纳（Senart）作了关于此本的专门报告。他确定该写本为属于公元 2 世纪的《法句经》（Dharmapada）（佛教诗集），文字是佉卢文（Kharosthi），语言为古代印度西北俗语（Prakrit）。在同一会议上，俄国梵文学家奥登堡（V. Oldenburg）宣布该写本的另一部分存于彼得堡。

这些偶然出土的发现品促使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组织和派遣考查队去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发掘。1898 年俄国科学院派出以克来门茨（D. A. Klementz）为首的考查队去土鲁番。克来门茨考查队在高昌古城进行了发掘，获得不少古物（包括第一批出土的回鹘文献）。1900-1901，1906-1908，1913-1916 英国派出以斯坦因（A. Stein）（原为匈牙利人）为首的考察队去新疆和敦煌，获得更多的古物。特别是在其第二、第三次考查期间他从敦煌取走了多达万件的各种古代语文写本（其中也包括突厥如尼文、摩尼文、回鹘文等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他在土鲁番也进行了发掘工作。

俄国和英国的成果刺激德国人急忙组织和装备了考古队去土鲁番。从 1902 到 1907 年和从 1913 到 1914 年，德国先后派出以格伦威得尔（A. Gruenwedel）和勒寇克（Le Coq）为首的四次考查队来新疆。前三次主要是在土鲁番工作。第四次则在库车。在前三次考查期间，他们几乎考查发掘了土鲁番地区的所有重要的遗址，包括古城高昌以及胜金口

耿世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Sengim)、木头沟(Murtuq)、柏则克里克(Bezeklik)、土峪沟(Toyuq)等地。他们获得了大量各种古代语文的写本(勒寇克说是17种语言,24种文字)、绘画、雕塑和其它古物。他们从鲁番、库车等地石窟中切割下许多壁画,运到柏林后再重新拼装起来,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出¹。在古代回鹘文献(用回鹘文、摩尼文等文字写成)方面,以德国获得的最多。现柏林科学院土鲁番学研究中心收藏的回鹘文献编号已超过5位数。

法国政府也派出了以伯希和(P. Pelliot)为首的考古队去塔里木盆地。他们主要是在巴楚(Maralbeshi)和库车工作。在敦煌伯希和也获得了大量的汉文、藏文和回鹘文的写本。

当日本京都西本愿寺主持大谷光瑞(1896-1948)在伦敦从报纸上看到斯坦因在南疆地区考古所获成果时,引发他想了解佛教从印度经新疆传往中国和日本的愿望。于是他组织了三次考查队去塔里木盆地搜寻古物(1902-1904,1908-1909,1910-1914)。

在简述新疆考古考查的情况时,我们不应忘记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芬兰的曼涅海木(E. Mannerheim)的名字。他们在收集回鹘文写本和其它古物方面也有一些收获。

1927-1935年由瑞典和中国两国组成的中瑞西北考查团,在新疆工作期间收集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文物。参加中瑞考查队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对新疆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也发现和购得了回鹘文文献,如现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玄奘传》就是由他携回北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1959到1975年,新疆博物馆先后在土鲁番进行了13次发掘。在50年代和60年代,新疆博物馆尚在尼雅、巴楚等地进行发掘工作。1959年新疆博物馆东疆文物队在哈密地区进行文物调查时,从当地一农民手中收集到了著名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据说出自天山一佛教寺院遗址中)。此外,近些年来在敦煌和新疆又有一些回鹘文文献出土。

二. 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Altun Yaruq)

Suvarnaprabhasasottama-sutra

回鹘文《金光明经》是目前回鹘文佛经中篇幅最大、保存较完整的重要文献之一。回鹘文本译自义净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梵文为 Suvarnaprabhasasottama-sutra。回鹘文为 altun Önglüg yaruq yaltryghlygh qopta kötrülmish nom ilig atlygh nom bitig。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土鲁番已获得此经的许多残卷。但最完整的写本(不是很多人说的木刻本)为俄国马洛夫(S. Malov)于20世纪初在我国甘肃酒泉地区所得²。

¹ 可惜这些古代维吾尔人民的艺术珍品一部分毁于二次大战盟军对柏林的轰炸中。

² 由于马洛夫在拼写发现地名时用的是甘肃方言,学界长期不知其确切地名。现知是“文殊沟”,位于酒泉

此书梵文原本似成书于公元 4 世纪，之后逐渐增大，成为唐代义净所据以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本子。此经发展了早见于《妙法莲花经》中的一些内容，为过渡到佛教秘宗的重要环节。

由于拉德洛夫(W. W. Radloff)和马洛夫在刊布(1913-1917)这部文献时，是用新铸成的回鹘铅字重新排版，未附任何图版，所以长期以来学者不知其庐山真面目(有人错误地说是木刻本)。直到 1982 年，日人百济康义和德人罗尔本(Röheborn)研究刊布了二叶(四面)保存在瑞典的该经影印图版后，我们才看到其真面貌(这二叶是 30 年代中瑞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Bergman)所得，恰是马洛夫本所缺少的那二叶)。写本用楷书体写成，笔划很近于木刻本。译为古代著名回鹘翻译家胜光法师(Shingqu Säli Tutung)。他生于别失巴里(Bishbaliq)(遗址在今乌鲁木齐北吉木萨尔县城附近)，约生活在 10-11 世纪。他先后从汉文翻译了《金光明经》、《玄奘传》、《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观心经》等佛教著作。他的译文语言流畅，词汇丰富。他不仅精通汉文，而且是一位运用母语的大师。此外，他似也懂梵文。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许多突厥学家研究了这一回鹘文重要著作。但迄今尚没有全文的校刊本出版。突厥学家们研究此书必须要懂古汉语或与汉学家合作，才能避免错误。例如 1994 年土耳其学者喀雅(C. Kaya)出版的《金光明经研究》一书，就因不懂汉文，把相当于“神通”一词的回鹘文译文 kügälig 拆成两个词 kuo 和 kälig。甚至突厥语言大师马洛夫院士也因不懂汉文，在翻译其中的“舍身饲虎的故事”时也犯了错误³。而我国的突厥学家则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再说当拉德洛夫、马洛夫刊布铅字排印本时，回鹘文文献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经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回鹘文献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圣彼得堡本子共 397 叶(794 面)，现存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支所。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所以这部《金光明经》就显得特别重要，它成为我们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言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之一(在数量上能和《金光明经》相比的其它两部重要回鹘文文献是三十年代新疆出土的回鹘文《玄奘传》和 1959 年新疆哈密出土的《弥勒会见记》)⁴。

西南约 15 公里。这里尚发现重要的回鹘文《文殊寺碑》，该碑已为笔者所研究刊布，见笔者《新疆文史论文集》，2001，北京。

³ 参见拙文《关于若干古代突厥语词的考释》，英文本题作《Notes on some Old Turkic words》，即将分别刊于《民族语文》和匈牙利 AOH, 2002 年。

⁴ 关于现存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情况参见拙著《新疆文史论集》中的有关文章和《回鹘佛教文献》(后一文的英文原文载土耳其新土耳其研究和出版中心出版的《Turkler》第三卷，2002 年和该书英文版“*The Turks*”，

此经甘肃写本写于清朝康熙二十六（1687 年）（见卷一末尾，卷三末尾等处的跋文）。写经人为 Bilga Talui Shabi, Ratna Vajra Shabi, Chakhshapat Manggal Toyin 等人，写经地点为敦煌。

此外，回鹘文本《金光明经》第一卷中尚包括有不见于汉文本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中的两个故事（似出自胜光法师本人的译笔）和《四天王赞》（为名叫 Tanwasin 的法师译自藏语）、《八大盛地制多赞》（为名叫 Amogashiri 法师译自藏语）以及书末的回向文（可能为写经人所撰）。

由于此书的重要价值，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突厥学家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先后对此书的部分研究作出贡献的有：缪勒（F. W. K. Mueller）在其 1908 年刊布的《回鹘文献汇刊》（Uigurica I）中，根据德国考古队在土鲁番所获得的该书的写本残卷研究了第一（序品）、第十六、十七等品中的一部分。1930 年班格（W. Bang）和葛玛丽（A. von Gabain）在《回鹘文献研究》（Uigurische Studien, UJb, Bd. 10）一文中，研究了第三卷第五品（灭业障品）中的一部分。1941 年葛玛丽在其名著《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后面所附的文选中对卷十第二十六品舍身饲虎故事进行了研究。1945 年土耳其学者恰哈台（S. Chagatay）在题作《金光明经中两个故事研究》（Altun yaruktan iki parca）（安卡拉大学语言和历史地理丛刊 46）一书中研究了舍身饲虎故事和书前的关于张居道的故事（后者不见于汉文本）。马洛夫于 1951 年出版的《古代突厥文献》中也收有此二故事。1958 年土耳其学者西·特肯（S. Tekin）作为德国汉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卷五第九（重显空性品）和第十（依空满愿品）两品（1971 年正式出版）。1961 年同氏又研究了第二卷分别三身品（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 UAJb, 卷 33）。1966 年同氏又研究了书末的回向文（buyan äwirmäk）（载《阿拉特 Arat 纪念论文集》，1976）。1976 年德国皮特·茨木（p. Zieme）研究了卷一第二品中的一部分（载苏联 1976 年出版的《突厥学 Turcologica》）。1977 年同氏刊布了德国本残卷中的上述张居道的故事残篇。1979 年德国罗尔包恩（K. Röhrborn）和毛艾（D. Maue）研究了第一卷中的《八大盛地制多赞》（载德国东方学会会刊 ZDMG, 卷 129）。1993 年 R. Finch 研究了第十六、十七品（TUBA 17）。

我本人早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对回鹘文《金光明经》的研究，先后发表《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等文。八十年代期间我的硕士研究生张铁山、阿力

肯、周北川作为硕士论文曾分别研究过此书中的个别卷品。此外，T. Ayup, M. Seyit 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下面我从回鹘文《金光明经》(26 品) 引用四行七言汉文原诗及其译文以见一斑:

汉文原文	回鹘文译文	回鹘文译文的汉文译文
祸哉爱子端严相	nä ada ärdi atayym	这是什么灾祸, 我的孩子
因何死苦先来逼	körklä -kiä ög ü k ü m	我的漂亮小儿子,
若我得在汝前旺	ölmäk ämgäk näch ü kin	死亡的痛苦为什么
岂见如斯大苦事	öngrä kälip ärtt ü rdi?	先把你夺去?!
	Sintidä öngrä ölmäkig	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Bulayyn ay k ün-kiäm	啊, 我的小太阳!
	Körmäyin äri muntitäg	我不愿见到这样
	Ulugh achygh ämgäkig	巨大的痛苦!

我们知道, 翻译诗歌不同于翻译散文。前者要求注意其艺术性, 而后者则要求忠实于原文。这里胜光为了生动再现诗句的感染力, 他按照古代突厥挽歌体诗歌的传统, 在翻译汉文四行原文诗时, 把其扩大成八行, 每行七音节。

最后, 我想在此处说一下长期以来我的一个愿望: 就是在我国出版俄国本《金光明经》的影印本, 以造福国内外的学者。希望有关方面与俄国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写本部联系交涉, 购买该文献的缩微胶卷, 在国内影印出版。